

吕纪是活跃于明朝成化、弘治年间的院体花鸟画家，是任何一部中国美术史都无法绕过的人物，素有“明代花鸟画第一家”之誉，影响甚至远涉日本，其花鸟绘画是日本屏风画的来源之一。

近年来，吕纪的作品频频见诸各大展览。从去年浙江省博物馆乔迁之江新馆后的首个大展，到今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“墨韵文脉——浙江省博物馆藏明清书画精品展”，再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的“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：故事新说——故宫博物院藏明代人物画名品”第三期上，都能看到他的真迹。对于吕纪的研究，也迎来一波热潮。这位被低估的画家，其名声及艺术价值，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。

▼《竹园寿集图》(局部) 吕纪、吕文英合作 故宫博物院藏



这个宁波人被誉 为“明代花鸟画第一家”



▲《蕉岩鹤立图》吕纪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楼世宇

二 吕文英合作留下一段画史佳话

和吕纪同时期，还有一位来自浙江、进入宫廷的吕姓画家，就是吕文英，括苍（今丽水）人，也在弘治年间供奉仁智殿，官至锦衣卫。只是吕纪以花鸟画受宠，文英则以人物画见长。人称吕纪为“大吕”，文英为“小吕”，两位画家常有合作，也会参加当时文人官员的一些雅集活动，舞文弄墨，诗画互酬。

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年），户部尚书周经（山西阳曲人）、吏部尚书屠濬（浙江宁波人）、都察院御史佘钟（山东菏泽人）同值六十大寿，同僚们来到周经私邸“竹园”置酒同庆。吕纪、吕文英亦在受邀之列。席间众人诗歌互答，兴味盎然，两位画家将此景画下，一幅《竹园寿集图》便应运而生。

这幅画开卷首先能看到屠濬隶书“竹园寿集”四字。卷后有时人录明吴宽《竹园寿集序》，另有吴宽、屠濬、周经、王继、闵珪、佘钟、秦悦民、许进、李孟暘、顾佐等十人题诗，以及周经题“序竹园寿集诗后”跋。

图画分为三段。首段绘周经、佘钟共赏鹤舞，同僚许进与周经二子作陪；中段以屠濬为中心，另有六位宾客题诗作颂；两位画家吕纪和吕文英把自己画在了末段。画中除了人物，兼有竹林、假山、桌椅、烛台以及寓意长寿的仙鹤等背景。画中诸人（童仆除外）均标注姓名，有的在庭院中观赏仙鹤起舞，有的在竹林间提笔弄墨，有的在石桌上作诗撰文。宾主皆穿官袍，按明制官阶一品至四品为绯袍，五品至七品为青袍，八品、九品为绿袍。

可以想象，擅长人物的吕文英和精于花鸟的吕纪各自使出了“看家本领”，吕纪画竹林、仙鹤等背景，吕文英画人物，分工明确，珠联璧合。时人评价，此画中“诸公之相，各逼其真”。全图所表现出的人情世态和笔墨技巧，令其“称于当时，传之后世，使人景慕之至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幅画中的屠濬和吕纪是宁波老乡。屠濬（1440年—1512年），字朝宗，为甬上屠氏第七世，为官有清名，弘治十年（1497年）升任兵部尚书，后调任吏部尚书，兼都察院御史，封太子太保。明武宗正德时，加封太子太傅，兼掌院事，继加封柱国。屠氏为望族，与镜川杨氏、西湖陆氏、槎湖张氏并称甬上“四大家族”。说起来，屠濬还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女士的先祖，其宅邸在今宁波市海曙区尚书街。因屠濬担任过的吏部尚书一职为百官之首，又称“天官”，故宁波人称其家为“天官第”，称其人为“屠天官”。

▶《夏景花鸟图》吕纪
云南省博物馆藏

三 后世知音中有一位抗日将领

吕纪的花鸟画，在当时即已名闻海内，徐沁的《明画录》、姜绍书的《无声诗史》等绘画史籍中均有记载，而且声名远播，成为日本屏风画的来源之一。他的《柳荫双鹭图》和《幽涧双鹭图》曾在日本出版的《听松清鉴》中著录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郑振铎先生遍访流传在海外的中国名画，并收录在其编撰的《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》中。吕纪的这两幅作品不仅是明代全景花鸟画的杰作，也是中国绘画影响日本的例证。《柳荫双鹭图》被称为“花鸟画版的《溪山行旅图》”，该画在艺术效果上与北宋范宽的旷世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虽仅画数只水鸟，却有近景、远景之分，又有高远之势，让人感受到山水的雄伟与壮丽。这种高远的意境也正是吕纪在花鸟画中追求的效果。

除了郑振铎先生，昆明人高荫槐（1889年—1976年）也是醉心于吕纪画作的收藏家。高荫槐，为民国时期滇军名将、国民党陆军中将，是“云南王”龙云的得力干将，曾参加台儿庄战役、武汉保卫战等重要战役，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家乡，任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、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等。

高荫槐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将，善书法，宗北碑，留下了多幅精美的书法作品，同时精于鉴藏，收藏了历代众多书画。上世纪50年代，高荫槐向云南省博物馆捐赠百余幅古字画，其中包括北宋郭熙的《溪山行旅图》，元代黄公望的《剡溪访戴图》，夏永的《黄鹤楼图》和《岳阳楼图》，任仁发的《竹禽图》，明代仇英的《右军书扇图》，吕纪的《夏景花鸟图》和《柳塘双鹭图》。如今，吕纪的这两件画作仍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。



鉴赏与收藏

应敏明

甬上朱金木雕和镶嵌木雕享有盛名，历史轨迹可上溯到唐朝。朱金木雕“三分雕刻，七分朱金”，重朱金粉饰；镶嵌木雕又称骨木镶嵌，用牛骨、黄杨、象牙等平嵌或高嵌，讲究骨木相融。今天，两者都是国家级“非遗”项目。仔细琢磨甬上木雕，从工匠能力、艺术性等多维度分析，甬上“清雕”难度最高，艺术表现力最强。

正如推崇文人书画般，古代中国的家具也推崇文人家具，如晚明和清初文人参与取材、设计的苏作明式家具。木雕也推崇文人参与确认题材和设计方案的木雕，文人木雕一般局限于清雕。清雕的刻面、技艺一目了然，犹如山涧清流，清水芙蓉，以素颜出现，惊羨世人。

圆雕、透雕、浮雕、浅浮雕等均可清雕。清雕也称“清刀”，毛坯雕刻、修光等一切雕刻流程，直至完工全凭“一把刀”。清雕越浅难度越高，浅雕雕出立体感更是难中之难。清雕来不得半点虚假，非聚精会神不行，最见雕匠功力。

甬上家具的清雕，是传统清雕技艺之一，纵观东阳、徽州以及福州等地的家具清雕，还是甬上家具清雅且文气。甬上清雕能够出彩，除了文人参与，还得益于好的“母体”——甬作家具。

甬作家具有两个特色：“五木合做”和“清水皮壳”。五木合做说是甬作家具一般由五种上乘木材做成，寓意“五世（树）其昌”。五种木材，大体指红木、楠木、榉木、花梨木、黄杨木，抑或紫檀木、黄花梨木等。甬作家具极重视造型、榫卯、线条、清刀打磨，一般施薄漆，呈清水皮壳，几近原木，和天然木材纹理相互辉映，这样的木雕呈现出的便是清雕。

甬作家具清雕有三个特点：一是注重材质，因材施雕。甬上清雕，弃用樟木，樟木木质粗，清雕细节

清水出芙蓉——甬上「清雕」



▲门板局部



▲清晚期甬作红木清雕大橱

难以刻画。选楠木等，楠木细腻，有韧性，宜入刀；榉木妙在自带山水纹理，可因势利导，浑然天成；红木清雕显高贵；黄杨千年不长，木质密度极高，适宜清雕吉子。二是题材选择偏文气。东阳、台州等地，家具木雕大量采用“三国故事”，人物“骑马打仗”多。甬上家具选择戏曲人物、文人雅士、八蛮人物居多，采用晚清海派画家的画本，突出文气。三是清雕以浅浮雕为上。浅浮雕对雕匠技艺的要求极高，要落刀无悔，刀刀见功力。

甬上清雕作品，史上曾屡屡出口海外。1876年，23岁的浙海关（设在宁波）副税务司文牍李圭，受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委派，前往美国费城，成为第一个以官方身份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。回来后，他写下《环游地球新录》一书，详细记录了参加博览会的情况。据该书记载：在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，宁波雕花器（包括宁波清雕花板），与中国参展的蚕丝、绿茶、瓷器、绸缎、景泰蓝等产品一起，在世博会上惊艳亮相，宁波雕花器一举夺得金奖。

目前，欧美回流甬上古代清雕作品时有所见。日本人尤喜宁波清雕，晚清至民国，有大量清雕花板从甬作家具上拆卸下来出口到日本，被日本人改装到他们制作的家具上，主要是榻榻门和其他装饰板，如今也纷纷回流。

甬上木作收藏，古代清雕作品奇货可居。甬上吉木堂艺术馆收藏有精湛的甬上清雕作品数件，如洗脸盆架、小凉床、八步床、大橱等。为了印证甬作清雕之出彩，选择三口甬作大橱浅浮雕作品，加以鉴赏。

清晚期红木清雕大橱，以榉木为框，红木为板材。两扇门单扇高108厘米，宽46厘米，山水人物通景图。左门上象象牙高嵌，上有诗句。橱门描绘的是夕阳时分，阳光斜映着溪流边的亭台楼阁，柳树返青，微风徐来，闲人持扇游玩，船家顺流而入，渔人在溪边撒网，山坡上隐约可见凉亭。右门上象象牙高嵌，诗云：此中竟日无闲事，得趣唯观一局棋。橱门描绘的是山坡上，松树高耸，树下两人对弈，两人观赏，神情怡然，牧马人在草上酣睡，马儿在旁嬉戏。这两扇门反映了追求隐逸的生活态度。红木清雕难度高，因为材质硬不易下刀。这件红木清雕作品，人物、楼阁、山石、树木等细节处理得准确、优美，艺术完成度很高。

清中期全榉木清雕大橱，以榉木为材，雕八蛮进宝图。“蛮人”一说最早来之于西周周公旦，将古时中原朝廷疆域以南的天竺、穿胸、僂耳等八国称之为“八蛮”。后来，“蛮”泛指来华的外国人。甬上雕刻经常用“八蛮进宝”题材。该两扇橱门，单扇高111厘米，宽48厘米。从图案来看，其树繁而不乱，山石皴法类中国画，石上山兰雅致，山峰利用榉木的自然纹理不施雕，和雕刻山峦自然衔接。蛮人长者慈眉善目，孩童天真可爱，动物健硕祥瑞。两扇门，人物开脸一流，山和树疏密有致，线条极流畅，雕得极浅薄，立体感强。

清中期全榉木云蝠纹大橱。两扇门单扇高114厘米，宽48厘米，雕刻云蝠纹，纯线条状。此雕工线条灵动不呆板，看似简单其实极不易，收藏界誉之为“雕玉工”“紫檀工”“乾隆工”，这是收藏家对工艺级别最高的评语之一。

这三口橱，橱门雕刻均为浅浮雕，清雅文气，独具魅力，是甬上清雕作品的经典代表作，体现了旧时甬上木雕精湛的刀艺和文人趣味，寄寓着人类温暖的情感，把艺术之美定格于永恒。

一 有「明代花鸟画第一家」之誉

吕纪（约1439年—1505年），字廷振，号乐愚，宁波人。明孝宗弘治年间宫廷画家，供奉仁智殿，官至锦衣卫指挥使。因为明朝虽有画院，却无正式编制，吕纪挂靠在锦衣卫，相当于“挂名千部”。

吕纪擅花鸟，亦能人物、山水。他的花鸟画有两种风格，一为工笔重彩画法，上溯五代黄筌，近迫明初边景昭，明末清初姜绍书《无声诗史》称其“作禽鸟如凤、鹤、孔雀、鸳鸯之类，俱有法度，设色艳丽，生气奕奕”，又辅以树木坡石、滩渚流泉背景，清新有致，格调高雅；另一为工笔淡彩兼水墨写意法，粗笔挥洒，简练奔放，与同时代画家林良的风格相近。有史料记载，吕纪笔下禽鸟栩栩如生，他画在墙壁上的雌鸡曾引来雄鸡依偎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吕纪算得上一位高产画家，存世作品分布于大江南北多家博物馆和艺术馆，从中能够看出，其花鸟所取题材，多含吉祥富贵之意，形式上追求富丽华美的审美意趣，是鲜明的宫廷画风。据称吕纪在画上常用寓意手法向孝宗朱祐樞进谏，帝知其用意，曾说：“工执艺事以谏，吕纪有之。”

吕纪被誉为“明代花鸟画第一家”，是艺术史上的一种共识，也是对他明代绘画艺术中地位的一种肯定。

去年在宁波美术馆举行的“盛世修典——‘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’成果展·宁波特展”上，曾展出吕纪多件作品的出版打样稿。其中《蕉岩鹤立图》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）画的是溪岸冬景，仙鹤一脚立于雪地，脚掌分开，一脚半举，作欲落未落之势，生动传神，仪态富贵。背景为太湖石、芭蕉，与仙鹤互为映衬，尽显安详静谧之境。

吕纪的另一幅代表作品《锦鸡山茶图》，不久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“墨韵文脉——浙江省博物馆藏明清书画精品展”中展出。